# 就业质量如何脱下“皇帝的新装”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人们常常将取得的优异成果,形容为“交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对于成绩的向往,人皆有之。然而,当你看到高校动辄亮出90%以上的就业率,但随处可见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心里又是作何感受呢?

中国高校目前就陷入这样一种“怪圈”——高校自行公布的《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粉饰着就业率不错、办学质量高的“太平”,但实际上就业差已成为许多高校不能遮掩的事实。

日前,针对教育部直属高校2015年度“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合规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的《“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评价排名》(以下简称《评价排名》)指出,这些高校存在着数据统计口径不一、可比性差,缺少对就业质量、就业趋势的分析,缺乏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缺乏信息监督机制等问题。

> “在教育部主导下,高校自评公布的就业数据依旧是报喜不报忧,‘接近100%的就业率堪比全球高校最高就业率’,不能为人所信服。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 就业报告公信力不足

就业率造假已经成为高校“不能公开的秘密”。

由于就业率事关高校的入学率、办学声誉,从校长至院长,至班主任、辅导员,一级一级都“签”了“责任状”。

“多年前,学生不签就业协议不让答辩、不给发毕业证书。这些年,虽然有所收敛,但是找个单位在协议书上盖章并没有真实就业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因此,高校对外公布的就业率永远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河南省某高校辅导员王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被包装的就业率、就业质量,备受公众争议,已不能作为考生、家长择校时的参考。

2013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要求高校按规定发布就业质量报告,对各校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就业趋势等作出数据统计和分析。

然而,在教育部主导下,高校自评公布的就业数据依旧是报喜不报忧,“接近100%的就业率堪比全球高校最高就业率”,不能为人所信服。

之所以报告的公信力不足,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看来,源自于就业统计口径并不严谨规范。根据教育部的规定,仅计算当年6月30日以前的就业率。“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包分配的做法,6月30日学生刚刚毕业不可能做到人人就业,所以‘高’不可信;晚于6月30日的就业就不算在内,显然在道理上说不通,所以‘低’同样也不可信。”

而在就业率的计算上,也是大有文章。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举例,如中央美院使用“非失业率”这一概念,按照如此大口径统计就业率,各校就业率均接近100%。但实际上,公众更期望看到纯粹的就业率,即签约率,同时也希望高校报告升学、出国、灵活就业、暂缓就业的各类毕业生比例。

“目前还缺少第三方评价(教育部75所高校采用第三方机构数据:2013年11所,2014年15所,2015年20所),高校自说自话也是导致公众难以信服的重要原因。”熊丙奇说。

## 高校该如何做好自评

不得不说,长期以来国内高校更多采取的是政府评价,但由于过多行政色彩干预导致弄虚作假、形式主义。从政府评价发展到高校的自我评价、社会评价,代表着一种进步。

然而,处于起步阶段的高校自评目前并不理想。《评价排名》显示,2013年部属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情况整体不达标,仅56.8分。2014年度报告的综合平均得分为60.2分。2015年为63.3分,但仍然在低分区徘徊。

那么,在就业问题上,高校该如何用好权力、做好自评呢?

熊丙奇表示,首先在规范性上需要得到保证。对就业数据的统计应该有明确的公式,对就业的统计时间也应该统一,每所高校的公式、统计时间不一样则没有可比性。

更为重要的是,高校须加强自身的就业质量分析。《评价排名》中揭示,一些学校完全没有就业趋势研判,或笼统地介绍行业发展特点,国家当前就业形势,缺乏基于自身就业数据对本校就业趋势进行统计分析。

熊丙奇建议,高校在编制就业质量报告时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有更多反映就业质量的数据,而不是形式非常简单的数据。前者包括学生毕业几年后的薪酬状况、用人单位对学生素质的评价、毕业生对学校办学的影响等等。“对就业质量进行跟踪调查。”

怎样用好自评权力,在别敦荣看来,高校更需要在就业工作上下功夫,而非在就业统计上花过多的心思,“因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是解决培养问题,重视就业工作更要重视教育、教学”。

《评价排名》反映,在对教育教学的反馈这一部分,很多学校只是一笔带过,既没有数据支撑,也缺乏具体阐述,叙述过于模板化,如“对招生规模、专业设置作适当调整”。

别敦荣表示,这说明很多高校编制就业质量报告只是为了完成统计任务,而不是以教学为导向。“就业与教学两张皮,两个部门各自做统计工作、缺少合作。打破这种局面,需要高校内部转变观念,不是为统计而统计,而是把与教学相关的教师、管理人员、学生视为就业质量报告的第一读者,这样才能发挥改善教学、进而改善就业质量的作用。”

## 如何用好第三方

就业质量报告遭遇的信任危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于高校的自说自话。邀请第三方机构参与,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然而,《评价排名》中显示有7成教育部直属高校未使用第三方评价数据。

不久前,高教法修改后新增添了“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效益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的条文。在事实上,鼓励高校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

“一方面,从教学改革的进程上看,发展第三方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现在很多高校要么没采纳第三方数据,要么第三方数据仅从网上搜集下来,根本没有权威出处。”熊丙奇说。

别敦荣补充,一些高校为了图省事,给第三方一笔钱,用其评估结果说事,这种情况在高校比较普遍。“但实际上,用好第三方不是简单地给钱办事,而是必须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从改善学校工作角度真正要求第三方提出咨询报告,这样才会有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教人士告诉记者,高校对于第三方机构的态度可谓“又爱又惧”。第三方在数据收集、分析上专业性是高校看重的,但是倘若高校自身就业情况不佳,引入第三方反而会自揭其短。“高校缺乏暴露问题加以改进的勇气。”

反例偶有之。2012年,上海大学和第三方机构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共同发布的《本科生教育教学质量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五大亟待改进的问题。这种暴露短处、自我加压的方式获得了同行赞誉。而高校就业质量报告何时敢于自揭其短,还值得人们期待。

另一方面,第三方机构自身发育不成熟,也成为制约高校选择其参与评估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处于初创阶段的第三方鱼龙混杂,对大学排行榜的评定更是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因此是否遵循办学规律作出专业的评价、是否保持机构的独立性作出客观的评价,也关系到第三方的数据是否真实可用。一方面高校要注重使用第三方,另一方面高校还要提高对第三方的鉴别力。”熊丙奇说。

## 主管部门的“做”与“不做”

从行政评价走向高校自评、专业评价,源自于主管部门的放权、推动,那么,在高校完成就业质量评估后,主管部门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呢?

据悉,2015年,教育部在通知中继续提出“将在2016年1月底前对各地和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情况进行检查”。由于往年的检查并未公开公布过结果,这不禁让人好奇,信息监督机制去哪儿了?

就业质量报告究竟完成得如何,从官方的角度无从知晓。但从一些侧面也流露出了“难言之隐”。教育部要求各校尽快制定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但目前在年报中明确提出就业评价指标体系的直属高校寥寥无几。

主管部门究竟要负怎样的信息监督之职?

熊丙奇认为,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要检查高校是否按照其要求进行就业质量报告的编制,并对高校完成就业质量报告进行总体评价,提出问题并针对问题要求高校从哪几方面来改善。

别敦荣补充,主管部门尽量不要过多干涉,一旦行政部门出面,高校为了应付检查难免注水。“不能一边说着高校的自主权不够,另一边一出现问题就要求政府干预,这在逻辑上并不通。高校应该面向社会,由社会、公众去问责、评价,行政部门只要指导高校完成工作即可。”

## 壹月数评

### 高校图书馆每周开馆不得低于90小时

本月初,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该规程明确,图书馆在学校教学时间内开馆每周应不低于90小时,假期也应有必要的开放时间,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全天开放;网上资源的服务应做到全天24小时开放。

对于这则新闻,网上曾有这样一条评论——图书馆开得长没用啊,宿舍关门早。

这条颇有些戏谑意味的评论很可能出自某位大学生之手,相信也只有身处于高校中,才能体会到一条规定背后所能牵扯到的各种关系。规定图书馆的最低开放时间固然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在实施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高校图书馆的利用效率,这其实是要打很大的问号的,毕竟除了开放时间外,学生们是否愿意到图书馆,图书馆又能给学生提供怎样的实际帮助,乃至于学校的其他规章制度是否与图书馆的开放规定相抵触,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不同学校有着不同的校情。

所以,与其简单而笼统地规定一个最低开放时间,其实反倒不如将这一权利交给学校,让他们根据自身情况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至于教育部本身,做好监督工作也就可以了。



图片来源:汕头大学图书馆

### 6年来我国更名高校已达472所

2016年以来,围绕着高校更名的纷纷扰扰就没有停止过。

今年1月,四川医科大学更名为西南医科大学,已经闹得沸沸扬扬;1月底,教育部公示的“2016年拟批准设置的39所高等学校名单”中,更有14所高校选择更改自己的校名;而就在本月,有媒体统计,近6年来,我国共有472所大学更名,这一数字已经占到了高校总数的23%。

虽然近年来高校更名数量剧增,但如果稍加归类,其实大部分更名无外乎四种情况——“学院”改“大学”、“地方”改“全国”、“专科”改“本科”、“单一”改“综合”。总而言之,校名要变得更加“高”“大”“全”。

对此,我们应该加以责怪吗?抑或这仅仅是一种“人之常情”?

高校更名潮的背后,其实是大量的利益考量,这一点无须多加解释,毕竟在大部分人眼中,“四川医科大学”与“西南医科大学”会是同一档次的高校吗?学校追求世人眼中的“高档次”,追求校名背后的隐藏利益其实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对此,公众不应加以讽刺和嘲笑。

反倒是公众本身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普遍认知是否出现了问题?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更应该反思,我们是否为校名背后所体现的所谓“规模”“档次”投入了太多不该投入的资源呢?

### 我国拟2020年初步建成中国特色开放大学体系

本月中旬,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意见》要求各地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在2020年初步建成中国特色开放大学体系,为学习型社会提供重要支撑,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重要保障。

在我国,国家开放大学正式诞生于2012年,是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没有围墙的新型大学。无疑,这种教育体系体现的是全民教育的新型理念,如果能够健康发展,一定会对提升整个民族的教育水平作出贡献。

之所以强调“健康发展”,是因为这种依托现代技术,面向大众进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机构,如果缺乏一定的监督,很容易成为某些人“捞文凭”的工具。而要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相关的监督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领域,十分缺乏的恰恰就是既专业、又“职业”的监督环境。所谓“专业”,即可以准确判断教育机构的发展问题,及时作出提醒和纠正;而所谓“职业”,即站在一个第三方的立场上,不主动干扰和影响教学机构正常运转。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开放大学体系的过程中,这样的监督环境,我们可能“同步建设”吗?

### 我国每年网络安全人才仅毕业8000余人

本月初,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网络安全专项基金捐赠仪式上,国家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局长赵泽良透露,目前我国网络安全方面人才缺口巨大,相关专业每年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之和仅8000余人,而我国网民数量近7亿人。

与这则新闻类似的还有本月发生的另一件事:鉴于儿科医生的紧缺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关注,国家卫计委正协调教育部恢复儿科学专业本科招生。而至今年,儿科专业已经停招了17年之久。

两则新闻其实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的专业设置为什么常常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而且滞后程度如此严重?

归根结底,目前我国专业设置的主导权依然停留在国家层面,而由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专业需求要“自下而上”地反映到顶层,相关调整再“自上而下”地落实到高校,这样的“反射弧”实在是有些过长了。

要想加快专业设置适应社会发展的速度,无外乎两条路:一是缩短“反射弧”,将专业设置自主权下放;二是加快反应速度,也就是疏通教育管理部门与高校和社会的沟通渠道。相比之下,后者治标,前者治本。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要比目前的情况好得多,而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些行动罢了。

### 招收5名以上残疾学生的学校须设资源教室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了《普通学校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指南》。该指南提出,招收5人以上数量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一般应设立资源教室。不足5人的,由所在区域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资源教室的布局,辐射片区所有随班就读学生,实现共享发展。

对于残疾学生而言,这是一则足以令人兴奋的好消息。

目前,我国的残疾人数量已经接近一亿,这中间有多少处在求学阶段虽无准确统计,但一定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根据教育部2013年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300多所高校中都有在读的残疾学生,其中本科院校占到1/3。

虽然近年来,很多高校“破格”录取残疾学生,为残疾学生提供各种便利的新闻并不在少数,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高校在无障碍设施建设,以及专门的残疾学生帮扶制度建设方面,相比国外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曾有留学生反映,国内高校的残疾人便利设施仅仅停留在设置盲道、阶梯处可供轮椅通过的无障碍通道而已。而国外高校则深入到残疾人生活的每个细节,甚至包括如何上下校车这样的小事。

正因为如此,此次公布的建设指南才显出其特殊价值,这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残疾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的一些“细节”问题,而不仅仅是“不得拒收”“减免学费”这样的宏观政策。 (陈彬)

## 中国大学评论

# 文凭贬值对大学的影响

■尤小立

大学文凭本身是有价值的,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它的存在至少反映了一段学习的经历、学术训练的过程,或者文化水准提升的标志,但现在看,中国进入文凭贬值时代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客观地说,只要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大学文凭的贬值就不可避免。但这里面仍有一个自贬和它贬的区分。“它贬”是客观的,物以稀为贵,拥有文凭的人多了,自然不再稀奇;“自贬”则是主观的,是主动地促使文凭贬值,如随意扩大规模、任性拔高“校格”,以及为了各种利益,不顾一切地滥发文凭,就属此类。

按理说,文凭发多了,因文凭而攀比的事情会少一点,但实际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人们正在想出更多的新名称,不断地增加“新鲜感”,从而形成新的攀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国内高校产生的“博士后”这个莫明其妙的“新文凭”;对“海归”来说,则出现所谓国外高校的“研究员”这个国内外信息不对称下的怪胎。

问题在于,类似名称上的“创新”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它不仅在文凭上,还在向职称以及其他方面蔓延。

记得八十八年前,白话文运动的旗手胡适曾写过一篇叫《名教》的文章。后来的学者似乎过于政治化地理解这篇文章的内涵。实际上,此文揭示了一个古代中国延续下来的现象,就是重名而轻实。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早已进入了后现代,但是,在重名而轻实的问题上,却还停留在古典时代。

这几年,诸如北京大学毕业生卖猪肉,名牌大学博士改换门庭说相声,硕士生退学开店等等有关大学的现象,常引发正反两种意见的争论。其实,这类事件背后都存在一个文凭贬值的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意味着各种追求的人都可以进入大学。由于追求不同,传统大学那种在学问上继续深造,在文化素养上持续型塑的理想,就很容易在社会潮流的影响下转变成更为现实的目标:为谋求更好的职业而努力奋斗!文凭因此异变成了一封职业介绍信。

同样是一张纸,传统的文凭与职业介绍信的差别相当明显。前者负载着相当的神圣感和荣誉感;而后者,因为上大学,甚至攻读研究生,都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的这个人生轨迹中必经的一个站点,荣誉感自然淡化,神圣感则既遥远,又陌生,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了。

人生的“成功”标准当然是多元的,但在时下,它却有一个一元的基础:金钱。大多力挺北大学生卖猪肉一类选择的人都在多元借口下包藏着那个一元的金钱的标准,哪怕是大学里的从业者也一样。因为时下的大学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和追求金钱,只不过是以各种名目来代称而已。这说到底,还是“名教”传统的遗迹。

科研项目即是一个例证。不仅名目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有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趋势。所有的项目的大小或者轻重与否又都由经费的多少来定位,各校有关的提成、计分、奖励也都照此办理。这就像多年前大学分住房一样,谁也不会拒绝。只是所有拿到的人都不再连称幸运,而是在心照不宣的同时,以为自己天然具备这个“情商”。

有了金钱这个标准,外加“权”的力量,那么,大学管理只有以公司化的绩效来操作,才显得合理。这个似乎“顺理成章”的过程,身在其中,是很难进行反思的。而没有经过反思的管理机制,只能让大学更加地瞻“钱”(公司化)顾“权”(行政化)。

对大学教师来说,从“神圣感”一下子速降到“职业化”,其职业热情不可能只靠所谓职业精神加以维持或规范。这就是时下大学里,教师工作(包括科研与教学)热情不高的原因之一。

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凭的贬值,更影响到尊严。没有了尊严,大学不是缩手缩脚、任人支配和随意宰割,而是相反,即什么事都敢做,什么事都能做。这样下去,大学也很可能徒有其名或者像胡适所说的成了“墙上的符箓”,实际上却是另一个与学术、教育日益疏离的新的单位。